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

Makesi Zhengzhi Jingjixue Pipan De Zhexue Yiyi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哲学意义

——鲍德里亚的批判及其回应

韩欲立 / 著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

Makesi Zhengzhi Jingjixue Pipan De Zhexue Yiyi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哲学意义

——鲍德里亚的批判及其回应

韩欲立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韩欲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309-09380-3

I. 马 II. 韩…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F0-0②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5074 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

韩欲立 著

责任编辑/陈一军 方尚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375 字数 202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80-3/F · 1894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也被视为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深层逻辑上一致的同谋。在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谱系中，鲍德里亚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劳动”和“使用价值”等基础概念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形成了具有极大挑战性的“鲍德里亚式”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它从反面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新巩固自己的“唯物主义”美切，更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以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本书试图在对鲍德里亚的批判进行初步回应的基础上重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指出鲍德里亚的批判的超历史性和抽象性，尝试更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要概念，重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高度及其历史辩证法原则。

丛书序

自2006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科建设就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旋律。近几年,从客观要求出发我们把学科发展的主要工作放在布点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学科点规模的扩大。但是,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是学科点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学科建设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因此,在学科点建立以后,就必须集中力量注重学科的内涵建设。

学科建设的内容有很多方面,但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是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内容,理论研究体现了学科建设的水平和成果。离开了理论研究来谈学科建设,容易把学科建设抽象化,或者把学科建设变为难以把握的东西。理论研究的实实在在的,可以把握的,并且能展现为具体的研究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重点应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点来确定研究范围,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然应该名副其实,而不应该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明确界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所属的各二级学科的范围,或者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泛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学科的理论研究。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建设的范围,否则,就可能既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也未必有利于其他学

科的建设。

二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只有体现这个品质,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在理论研究中要把握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无从说起,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有新的方法、新的内容,不能只是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老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没有反映实践发展的理论研究,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更不容易,做到二者的统一,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这套“复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是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丛书突出研究的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成果。论丛的作者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团队为主体,以及集聚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一平台上的理论研究队伍。我们力争用几年时间,经过努力,集中展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

顾钰民

2012年9月

对于当前的年代而言,符号胜于所指物,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表象胜于本质……真理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事实上,神圣性正依真理之减少和幻想之增加的程度而增加,所以,最高级的幻象就是最高级的神圣。

---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推动知识和意义、累加话语(cumulative discourse)的线性语段积累的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的辩证法的终结。同时也是使得积累和社会生产成为可能的唯一物——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还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的线性维度的终结。这更是符号的古典时代和生产时代的终结。

---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

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分析后现代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消费社会、媒体、信息、计算机等现象时,马克思的范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它完全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决定着什么样的媒体、信息、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和商品将被生产和分配。

--- 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我常常看到,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种观念的表面更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

---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目 录

导 论 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 / 001

第一章 为什么是鲍德里亚：鲍德里亚理论前史 / 049

第一节 作为革命文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
退隐 / 049

第二节 消费社会：后现代理论童话的常规社会置景 / 072

第三节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结：20 世纪中后期
法国哲学氛围 / 084

第二章 续写马克思：从《物体系》到《消费社会》 / 105

第一节 物的符号化及物体系的形成 / 107

第二节 消费社会的符码操控 / 127

第三节 现代拜物教理论：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的
比较分析 / 139

第三章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符号、生产与象征交换 / 150

第一节 符号价值及其运行机制：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起点 / 152

第二节 拒斥历史唯物主义：从对马克思的生产主义逻辑的
批判出发 / 167

第三节 新的路径：象征交换？ / 178

第四章 重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 / 190

第一节 作为批判逻辑而非实证逻辑的马克思的哲学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 / 191

第二节 理论的革命与反革命:作为后现代理论的鲍德里亚
批判策略 / 199

第三节 重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要概念 / 206

参考文献 / 218

后记 / 225

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

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乃至文化观念结构深刻变迁的时期。这种变迁的深刻性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更为广阔的左派理论光谱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其中,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事实上,众多当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左派理论家如鲍德里亚、齐泽克等人都深受这一理论传统的影响。在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过程中,来自后现代理论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批判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巨大挑战。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问题上,一些后现代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同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深层逻辑一致的同谋者。在这种批判理论谱系中,来自鲍德里亚的批评最具有根本性和挑战性。必须承认,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维度的思考,我们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功能,却使得历史唯物主义长期脱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基础,以至于其传统概念对当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其他经济活动过程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更新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调整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上来,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历史

唯物主义的经济学基础和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必须重新建立起“被更新”的内在联系。

一、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判定

既然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来回应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那么首先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来直接面对和判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阶段。

1. 全球资本主义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成为全球最具统治力的制度和体系,并且它利用这种统治力不断对异质性内容进行重构,以抵消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抵抗性力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思想观念领域,左派思想家自然而然地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新的判定,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它的胜利无疑是对世界历史而言最为重大的事件,因此,“全球化”从地理—政治的意义上讲,一方面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地理范围内的无限制发展,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同一化发展的认定。于是全球化似乎成为一种共识,但是显然全球资本主义这种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定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显然回避了生产方式变迁的判定标准,“全球化”至多可以从时空概念上来表明一种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划界方式,而不能揭示“全球”资本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前一个阶段的历史性“断裂”,这样就不能把它从总体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特殊发展阶段来加以认识。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自我重组的一种征候而已。

2. 后资本主义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韩国、日本等东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他认为世界正在向“后资本主义社会”

转变”。在他看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资源是知识;同时在这个多组织的社会,真正控制资源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是知识,而不是资本、土地或者劳动力。社会阶级也不是划分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对立式阶级结构的“资本家和无产者”,而是划分为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资本家从阶级结构的金字塔顶端逐渐下降,被职业经理所取代。在整体上,民族国家逐渐失去作为唯一的权力机构的地位,代之以特大国家和多种跨国的、跨地区的多国组织。资本的社会化与劳动的社会化似乎都在显示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是左翼学者所批判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了。吉布森-格雷汉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左翼学者不能认真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并顽固地坚持基于“劳资对立”的经济社会学说来展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这显然是“目标缺失”的错误。

我们注意到德鲁克并不等同于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所要表述的是,当人们在关注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发展模式解体 and 失败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随着其对立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了,“摧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的这种力量也在逐渐废弃资本主义”^[3]。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矛盾和冲突的资本主义时代也宣告结束,而代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的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后资本主义的判定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意义上的。德鲁克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义是基于经验和现象的划分方式,他看到了阶级和社会结构带来的传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经济地位和文化身份上的新的分化。但是,在苹果公司总裁每小时挣 12 000 美元,而一个海地工人每小时挣 28 美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判定德鲁克意义上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

[3] 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出版于1998年,根据他的理论,他预言所谓“后资本主义社会”将在2013年或者2020年左右到来。

[4] 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7页。

他的观察对象仅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站在资本主义的中心来看世界,他的视野相对来说无法扩展到亚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所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因此,后资本主义的判定显然具有超历史和超阶级的特征,这并不符合真正的世界历史事实。

3. 后工业社会

丹尼尔·贝尔因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而名噪一时,其非阶级化的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继承也成为他能够在20世纪80—90年代获得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贝尔试图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阶级分析和生产力分析的叙事逻辑,认为“具体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依次更迭的“理论图式”,而科技发展和“中间阶级”(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专家和白领阶层)的壮大,将引导所有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而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用五个方面的特征来加以说明:第一,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第二,职业分布方面,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第三,中轴原理,即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第四,未来的方向是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第五,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①。贝尔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日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贝尔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主要力量。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各种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且,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起作用,同时,也对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进行着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①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称自己为“后马克思主义者”^②。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的第一章中,他以“后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对话”为题对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了一种解释。事实上,这也是“后工业社会”学者对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澄清。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贝尔选择的是知识与技术的变化这一中轴。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在工业社会资本优先,在后工业社会知识优先。“后工业社会的根子在于科学对生产方式不可抗拒的影响。”^③

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的标准是所有权,而后工业社会的分层标准则是知识和教育,它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基础,是知识架构起来的社会。实质上这是以职业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一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主的划分标准。列宁曾批判过把收入或职业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错误观点。以收入来源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就相当于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个错误马克思早已指出过。把职业的差距同阶级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实际上有抹杀“阶级”的概念和取消阶级斗争的趋势。

后工业社会理论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他的“与马克思对话”的后马克思主义态度直接启发了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1页。

②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序言第5页。

③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

4. 晚期资本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①概念的演变经历了从经济分析到文化—政治分析的转变过程。曼德尔(Ernest Mandel)以《晚期资本主义》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作为第四国际领袖的曼德尔与我们通常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自从斯大林在苏联获得胜利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施到葛兰西或阿尔都塞,在欧洲左派力量的整个思想史的许多方面占据着前台”^②。西方马克思主义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维度,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尤其是人道主义哲学部分。实质上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退回到唯心主义。“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

① 曼德尔是第一个使用“晚期资本主义”来判定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特征的,按照他的看法,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晚期资本主义最初的起点——资本增值方面各种条件的根本改进,这是由于工人阶级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情况下遭遇了种种历史性的挫折而造成的结果;晚期资本主义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随后发展;晚期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固定资本生命周期的缩短、技术发明的加速、永久性重整军备对剩余资本的吸收;晚期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特殊关系——资本在国际的积聚和集中,这生产出作为资本表面主要形式的多国合作,也生产出以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同水平而生产商品的国与国之间的外汇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控制着国际贸易;晚期资本主义实现问题的新形式和解决办法——永久性的通货膨胀和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贸易周期,这种贸易周期在通货膨胀的标志下把一种古典的工业周期与信用扩张和信用收缩的反周期结合在一起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功能的进一步扩大;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具有深信技术无限威力的特点;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无法避免(参见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此外,关于为什么要用晚期资本主义而不用新或后资本主义概念来称呼这一阶段,曼德尔的解释是:我们必须表示十分遗憾,因为我们未能对这一历史时期提出一个比“晚期资本主义”更恰当的术语——我们对这一术语之所以感到不满意,是因为它是按年代而言的,不是综合而成的。在该书的第十六章里,对于这个术语为什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仍很适用,我们作了解释。这一术语与“新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比的话,其优越性是很明显的——后者的含义模棱两可,既可以解释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有基本的连续性,也可以解释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没有连续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从讨论中我们会得出一个更好的综合性的术语来。在此期间,我们仍然保留“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我们觉得,这是可以想出的最有用的一个术语,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真正重要的不是命名问题,而是对我们时代所发生的历史发展做出解释(参见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②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锟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2页。

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1]但是“贯穿这整个历史时期的、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传统,在‘舞台以外’继续存在着,并得到了发展——而且在法国暴动时期及其后,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的政治关注。当然这是指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遗产……由托洛茨基派生的传统,在最基本的方面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恰成极端的对比。它集中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哲学”^[2]。佩里·安德森评价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认为它“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发展所作的首次理论分析”^[3]。

曼德尔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坚持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他认为虽然晚期资本主义具有独特之处,但是它并不与马克思的早期分析相矛盾,相反,它是一种更加纯粹,更加发达和更加充分地实现了的资本主义形式,“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绝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发现成为过时。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就广义言之,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各种特点,对晚期资本主义都仍然完全适用”^[4]。因此,在曼德尔看来,晚期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并没有后现代主义理论或者后工业社会理论所宣称的那种明显的断裂,而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结构上的一种调整和关于这种调整的危机。

弗里德里希·詹姆逊继续沿用了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他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阶段理论:第一个阶段是古典的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是多国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而相应于三个阶段的不同的经济结构而言在文化观念

[1]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锜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69页。

[2] 同上书,第122—127页。

[3] 同上书,第126页。

[4]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上存在着三个相互对应的社会文化阶段,即第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化,第二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相应于第三个时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其代表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声称,他的研究深深受到了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启发^①,将“后现代主义看成一种广泛的文化逻辑,并将之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联系”^②。詹姆逊基于文化逻辑的分析判断,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后现代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詹姆逊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了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了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思想。

虽然同样使用着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哈贝马斯并不完全同意曼德尔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实质的判断。哈贝马斯把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后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形态。哈贝马斯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马克思分析的、古典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了由“国家管理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这种变化,人们不应该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范畴,而应根据情况重新考虑,对它们做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解释^③。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基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也十分不满,他基于晚期资本主义本质状况的判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首要的因素,并逐渐取代了社会劳动成为价值增值的主要来源,甚至

① 詹姆逊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与曼德尔的思想联系,认为曼德尔运用一种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理论化。这一划分也使得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成为可能,由此,后现代主义可被理解为是对第三阶段文化生产的特殊逻辑理论化的尝试,而不是另一种脱离现实的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批评或精神诊断(参见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四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②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③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译序第9页。